

乐声低沉肃穆，一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在舞台亮起，如同一本缓缓打开的旧书，时间回到1937年，南京最冷的那个冬天。

11月21日至23日，舞剧《记忆深处》国际版在法国巴黎上演。当这部为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而创排的舞剧临近结束时，一位位冒险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暴行的国际友人的肖像投影在舞台上，掌声雷动。演出谢幕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10分钟，啜泣声此起彼伏。

艺术为桥——铭记不能遗忘的历史

舞剧中的“张纯如”，一袭白衣，奋笔疾书；真实的张纯如，燃烧生命，秉笔直书，让南京大屠杀进一步为国际社会所关注。

张纯如1968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她祖籍江苏淮安，从小便听家人提起南京大屠杀，但直到1994年底，26岁的她在美国圣何塞城郊参加会议时才亲眼看到这场浩劫的历史照片，被侵华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震撼。当时，西方社会对南京大屠杀了解甚少，甚至没有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英文专著，日本右翼分子也一直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这令张纯如坚定决心，全身心投入这场惨绝人寰的屠城历史史实研究。此后3年，她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等机构查找当年的日记、信函、政府报告等原始资料，在南京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寻访幸存者 and 亲历者后人，通过书信联系日本老兵，阅读一桩又一桩日军暴行记录……

1997年，南京大屠杀发生60周年之际，张纯如所著的《南京大屠杀》出版发行，轰动世界。作为“人类史上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南京大屠杀》再版10余次，印数近百万册。搜集整理资料时，张纯如还意外发现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和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记录的文献资料，并最终促成《拉贝日记》与《魏特琳日记》出版发行。

这些都成为舞剧《记忆深处》的历史背景与创作来源。“遗忘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该剧导演佟睿睿说，“舞剧没有虚构内容，以《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东史郎日记》为基础，所有人物均真实存在，演员用肢体语言将人物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无法言表的悲愤呈现于舞台。”2018年，《记忆深处》在中国国家大剧院上演。

与传统舞剧不同，《记忆深处》并不分幕，用“张纯如”与几位历史当事人的舞台互动，讲述1937年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以及各个人物的心声。“张纯如”以日记、报纸为“隧道”，在“战场”和“书房”两个时空中穿梭往复。她看到，以拉贝、魏特琳为代表的“守护者”，试图搭建安置所为民众提供庇护，但面对日军胁迫却无能为力；以李秀英为原型的“幸存者”，于绝境中与侵略者殊死搏斗，却无可避免地承受巨大痛苦；以东史郎为原型的“侵略者”，在军国主义裹挟下泯灭人性、实施暴行，也因良心谴责，试图用道歉、公布真相等方式忏悔，却永远无法洗净沾满鲜血的双手。

对“个体记忆”的深耕，成为舞剧对反法西斯主题的深刻诠释。守护者的悲愤与坚持、亲历者的痛苦与勇气、施暴者的残忍与忏悔……这些个体的“记忆碎片”编织成一张细密的情感大网，屠杀、见证、忏悔、否认等主题构成一个篇章，如镜面般折射历史真相，直抵观众内心：

——演员们排着蜿蜒的队伍走到台前，在枪声中直挺挺倒下。观众仿佛看到凄冷冬夜中，安全区百姓被日军残忍屠杀，“拉贝”痛苦万分却无力阻拦，他悲痛地捶打舞台地面，正如拉贝在日记中真实所述：“我丝毫不后悔留了下来，因为我的存在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尽管



如此，我仍然感到极端的难受！”——“张纯如”回到书房掩面坐下，抱头沉思。再起身时，她面色凝重、整理衣着，伸出手、埋下头，快速敲击键盘。她大幅度扭曲身体，无数次弹跳、瘫倒、翻滚、撕扯。这也是张纯如的现实经历：对苦难的挖掘让她心力交瘁，右翼分子的威胁令她痛苦难安，2004年，她难堪重负，自杀离世。舞段结束时，“张纯如”刚毅笔直，她站在光束里：历史已被记录，无论岁月磨砺，无惧否认诋毁，她用生命书写的血淋淋的真实历史必将永存，警醒世人。

多方合作——打造跨越国界的舞台

2024年，《记忆深处》筹备赴法国巴黎歌剧院演出。法方对作品高度认可，剧院议会全票通过演出申请。这座剧院有300多年历史，隶属法国文化部，与巴黎歌剧院齐名，能获邀演出十分不易。今年11月，由德国舞者塞德里

克·普鲁饰演“拉贝”、美国舞者凯西·诺科米斯·佩雷拉饰演“魏特琳”、日英混血舞者富冈耀饰演“东史郎”的《记忆深处》国际版登上巴黎舞台。

让外籍演员演绎南京大屠杀，最重要的是充分理解历史，传递人类共通的价值观。“演员表演不能局限于舞蹈技巧，更要演绎心灵——从悲痛中提炼艺术表达，在舞台上展现情感力度。”佟睿睿说。

普鲁是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的独舞演员。在《记忆深处》中，他不再追求阿拉贝斯克等芭蕾技巧，而是用扎实、笃定的动作“守护百姓”，力求精准有力地表现“拉贝”坚定的决心。他主动提出剃光头，因为“这样更像拉贝”。剃后戴上眼镜，再加上排练期间体重下降，普鲁的外形与拉贝高度契合——参观拉贝故居时，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惊叹：“你简直就是真实的拉贝！”

舞台中央，“魏特琳”的身影慢慢拉长，她手中的“日记”呈现出受害者的剪影——颤抖的肢体、求救的双手、绝望中相互搀扶的身影……在这样的场景下，

佩雷拉用沉缓悲悯的肢体动作，将渴望拯救更多中国人却不可得的巨大痛苦具象化，每一个顿挫、每一次展臂，都像在历史尘埃中打捞被遗忘的生命。

“东史郎”要在一个多小时里完成从暴虐到忏悔的剧烈转折，表演难度最大。富冈耀用舞蹈呈现日本军人的刻板姿态——每个卡点都清晰准确，瞄准动作干脆到位，部分段落节奏极快。他反复擦拭双手的动作，正寓意着“日本侵略者想擦掉手上的鲜血，但这是永远无法洗脱的罪行”。

以史为鉴——传递守护和平的信念

在法国演出期间，《记忆深处》场场爆满，直至最后一个音符落下，观众才从持续的压抑中缓缓松开情绪，起立鼓掌。国际版的推出，不仅为这部作品带来更大的舞台，也让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再度走入国际观众视野，让更多人主动去了解这段历史，共鸣“勿忘历史，守护和平”的呼唤。

“那道伤口依然没有愈合。”法国作家、记者埃尔万·巴里洛观演后如是说。他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却未曾真正意识到这段历史对于中国人民的重量，直到在观演中“与中国人民产生了共情，因为舞剧呈现的是人类共同的悲剧”。“这是中国，也是整个人类极痛苦的一章，是一堂必须补上的历史课。如此巨大的创伤必须用刺痛人的艺术形式来呈现，它让人无法保持中立，被迫直视伤痕。”巴里洛说。

对外籍演员而言，这次合作也令他们更加了解南京大屠杀。排练期间，中方团队为每名演员提供历史人物的日记原文，安排他们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拉贝故居、侵华日军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等地。慰安所中，有一座雕塑，名为“流不尽的泪”：一位老妇人的脸庞上，泪水如断线的珠子般不断滑落。纪念馆提供纸巾，让参观者为雕塑擦拭眼泪。这一场景也成为舞剧中“流不尽的泪”段落的灵感来源。佩雷拉为雕塑擦泪时，不禁低头落泪。张纯如对正义的追寻和坚持，魏特琳对“本可以救更多中国人”的无助和自责，令她无比动容，她希望把这部“永远留在她心里”的作品带回美国，尤其是张纯如生活过的加利福尼亚州，“让更多人理解这段历史，也理解女性在战争中所承担的责任与展现的勇气”。

参观慰安所后，一向活泼的富冈耀沉默了一路。“加入这部舞剧前，我并不知道它背后有如此沉重的历史，这让我有机会面对历史，反思当下。”伴随排演深入，他也愈发深刻地体会到“个体一旦被卷入战争，便没有了回头路”。

历史需要被铭记。这是《记忆深处》的创作初衷。这部舞剧用跨越国界的艺术语言，表达了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守护和平、反对战争。南京大屠杀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重的创伤，更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警示碑和捍卫和平的永恒坐标。

正如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的引言中所说：“除非有人促使世界记住这段历史，否则悲剧随时可能重演。”今天，战争的阴霾仍未散尽，沉痛的过往警钟长鸣；和平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需要一代代人主动守护的珍贵成果。和平呼唤所有国家和民族携手同行，共建一个铭记历史、珍视生命、守望相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肖凯元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片由上至下依次为：“张纯如”张开双臂，诉说南京大屠杀苦难；面对“日本右翼分子”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否认，“张纯如”（前排中）悲愤交加。

以上图片均为舞剧主办方**宽街精彩**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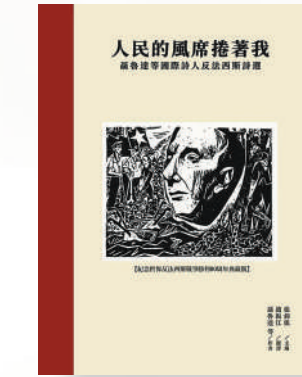
集》。1995年，德国政府委托埃丝特·沙莱夫—格茨和约翰·格茨创作了这件艺术品。两根高耸钢柱形似桅杆，一根寓意汇聚记忆，时刻警醒人们铭记历史伤痛，反思战争与暴力；另一根则象征播撒新生，寄寓和平年代重拾人道、尊严和对话。1996年，一座同样主题雕塑在德国城市马尔落成。

导览最后，乔安娜让我们去抚摸一下“代表自己国家的石头”。这组艺术作品名为《重生》，193块石头象征着联合国的193个会员国，由意大利艺术家米开朗基罗·皮斯托莱托创作于2015年。这些石头大小不一，每一块上都镌刻着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名称，寓意二战后世界的“重生”。石头组合的方式来源于数学符号“无限”的变体，形似3个相切的圆形：两边的圆代表自然界和科技社会，中间的圆连接两者，寓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人携手合作的未来。

离开万国宫之际，我看到外墙上用6种语言镌刻的“和平”。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今天，这个希望与沉重交织的词语久久在心中回响：真正的和平，不仅是止戈散马，硝烟散尽，更是世界各国平等相处，让文明间的友好对话永不落幕。

《人民的风席卷着我》——国际诗人反法西斯诗选

赵振江



今年9月，我译的《人民的风席卷着我》；聂鲁达等国际诗人反法西斯诗选》（见上图，赵振江供图）在台湾与读者见面。这本书是2015年于北京出版的《西班牙在心中：反法西斯诗选》台湾版。10年前，我选译了5位著名诗人关于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诗作；今年再次出版，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此后逐渐演变为西班牙人民反对受到希特勒支持的佛朗哥法西斯政权的斗争。来自全世界54个国家的约3.5万名工人和进步人士组成国际纵队，与西班牙民众一同战斗。这些人中有100多名炎黄子孙，他们大多是侨居欧美各国的华工。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结束后，部分国际纵队成员奔赴中国抗日战场，同中国人民一道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和彭德怀同志曾送一面锦旗给这些国际纵队中国支队战士，上面写着：“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我们所熟知的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人就是从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场辗转来华，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

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上，有一群著名诗人。他们关心民众疾苦和人类命运，不仅积极参与了这场保卫共和国的战争，还以笔为刀，创作了一系列享誉世界文坛的诗歌，揭露战争的残酷，谴责法西斯暴行，歌颂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在这本反法西斯诗选中，我选定了智利的聂鲁达、古巴的尼古拉斯·纪廉、秘鲁的巴格略、西班牙的拉菲尔·阿尔贝蒂和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后又想起墨西哥诗人帕斯的《致牺牲在阿拉贡前线的战友的挽歌》，把它放在了附录里。大陆版书名《西班牙在心中》，是聂鲁达一本诗集的标题；台湾版书名《人民的风席卷着我》则来自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同题诗歌。

《西班牙在心中》1937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面世，共23首。诗句朴实无华，充分表现了诗人聂鲁达爱憎分明的激情。其中《国际纵队来到马德里》的写作时间在1936年11月8日，即第十一团的3个营抵达马德里的日子。当时马德里已进入巷战，两天之后，该团有1/3战士阵亡。《哈拉马河之战》写的是1937年春天的一场历时20余天的著名战役。佛朗哥的军队于2月6日突袭哈拉马河谷，意在截断马德里与巴伦西亚之间的公路。共

我坐在死者的尸体上(节选) (西班牙)米格尔·埃尔南德斯

我坐在死者的尸体上
两个月来他们默不作声，
亲吻空空的鞋子
愤怒地抓紧心灵之手
和维系着它的生命。

让我的声音升上山顶
落在大地并化作雷声，
从此时起直到永远
都如此要求我的喉咙。

请你靠近我的呼喊，
用乳汁哺育我的村庄，
树木用它的根系
为我构筑了牢房，
我会永远留在这里，
为了爱你并捍卫你

和国军守卫在哈拉马河东岸，火线长达16公里，国际纵队的4个团协助他们。在整个战役中，共和国军队死伤过万，在国际纵队中，以第十五团的“英国营”和美国“林肯营”损失最重，阵亡者在半数以上。国际纵队中有不少诗人，有的壮烈牺牲，有的幸存生还。他们有关西班牙内战的作品，后来编成集子出版，聂鲁达的《西班牙在心中》是其中的杰作。

尼古拉斯·纪廉，作为古巴代表团成员，他于1937年赴西班牙出席“作家保卫文化国际会议”。纪廉在那里创作了《西班牙：四种苦恼和一个希望》，这首长诗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巴格略是秘鲁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最具代表性的先锋派诗人。他的诗作难懂难译，用词虽不艰深，但句式灵活多变，意象又近乎诡异，加上不时影射宗教内容或古印加文化传统，使人难以捉摸。他曾两次亲临反法西斯前线，写下《西班牙，请拿开这杯苦酒》——如直译，应为《西班牙，让这杯离开我》。这句话模拟了《圣经》，“杯”指的是耶稣即将遭受的苦难。巴格略所说的“杯”，显然是指西班牙人民正在遭受的苦难。现在这个译法，既想关照语言的表层结构，又考虑诗句的深层含义，还要让读者容易接受。至于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只能由读者来评判。一个标题的翻译就如此复杂，具体到每一句诗，同样如此。在此，我只想告诉读者：如果你觉得这些诗不像诗，只能怪译者的功力不够，而非巴格略之过。

拉菲尔·阿尔贝蒂是一位“世界公民”。在西班牙内战中，他有着“街头诗人”的美誉。内战后，他在国外流亡39年。1957年到中国的访问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国的古老文化和奇特风景，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等，无不令他惊叹不已。1958年，他发表了诗集《中国在微笑》。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是一位传奇诗人。他生于1910年，11岁开始自学，阅读了大量16至17世纪的诗歌。1933年，他出版第一部诗集《月亮上的能手》。1936年，他加入西班牙共产党并亲临前线，参加了保卫共和国的战斗。战后，他被佛朗哥政权判处死刑，后改为30年监禁，于1942年病死狱中，年仅31岁。《人民的风》是他的代表作，共25首，《人民的风席卷着我》是其中之一。

埃尔南德斯也是一位大无畏的反法西斯战士。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聂鲁达在悼念埃尔南德斯的诗中说，“通过你的死，我学会了生：我的眼睛几乎没有模糊过，我有的不是哭泣的泪水，而是无情的子弹。”这也是所有正直、善良的人们共同的心声。

如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过去80年了，但世界并不太平。区域性战争从未停止。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能忘记昨天的历史和血的教训。

（作者曾为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中国西葡拉美文学学会会长）

用鲜血和口
这两杆忠诚的枪。

既然我脱离了大地，
既然我带着贫穷
从不幸的母腹诞生，
我就注定会变成
不幸的夜莺，
厄运的回声，
不停地将这样的人歌颂，
无论我怎样歌颂痛苦，
歌颂穷人，歌颂土地，
他都会洗耳恭听。

（选自诗集《人民的风》）



清晨的日内瓦湖洒满金色流光，阿尔卑斯山静默伫立远方。万国宫，一座被翠林与喷泉环绕的庄严建筑群，宛如镶嵌山湖间的明珠。不论是融合古典与现代主义的庄严建筑，还是由各国赠予的壁画、雕塑等艺术陈列，都令游人流连忘返。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作为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万国宫迎来众多国际会议和庆祝活动，同时开放更多导览参观，帮助公众理解和平、合作的重要性。我和家人预约了参观，展开一次期盼已久的公共教育之旅。

“万国宫的诞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对和平的向往密不可分。”来自巴

万国宫的和平之声

郭春宁

西的导览员乔安娜用深入浅出的历史问答，向我们展示了万国宫的历史：1926年，国际联盟决定兴建新总部，为成员国提供一个以和平对话处理国际争端的场所。1927年，377份方案经过角逐，最终由瑞士、法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5位建筑师合作设计，主体建筑群于1929年动工。

然而，寄寓和平期望的万国宫却见证着世界一步步滑向战争深渊：1933年，日本、德国先后退出国际联盟；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1938年万国宫落成之前，法西斯点燃的战火已在世界多地蔓延。

正因如此，在万国宫联合国图书馆大厅凝视油画《和平之梦》时，内心难免五味杂陈——这幅巨大的油画由挪威政府赠予国际联盟，当它于1939年底运抵万国宫时，德国已经占领了波兰。油画

创作者、挪威画家亨里克·索伦森是一位反战主义者，他借助蓝、黑等暗色展现苦难，白、金等亮色铺陈希望，56平方米的油画上记录受压迫者的痛苦和战斗，也画下人们携手而行、向上攀登的瞬间。在人类的至暗时刻，这幅画寄托的和平愿景格外珍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于1946年退出历史舞台，万国宫成为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在此后的岁月里，它见证着联合国守卫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福祉的努力。如今，它为联合国系统内的专门机构提供会议设施与服务，每年组织约8000场会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的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

和平年代，万国宫新添的艺术品仍寄托着各国反对战争、祈愿和平的共同期盼。在万国宫阿丽亚娜公园树林间，静静矗立着雕塑《种子的传播，灰烬的收